中國農村婦女經歷過革命嗎? 今天還剩下什麼?*

賀蕭(Gail Hershatter)**著 高 曉 飛 ***譯

序言:過去和現在

2011 年,我的書《記憶的性別:中國的農村婦女和集體的過去》(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出版了,中文譯本正在進行中。今天我除了想談一談這本書,同時也回顧一下這本書出版之後發生在中國農村婦女中間不斷加快的變化。兩者放在一起引出這樣一

* 本文為 2015 年 6 月 2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學術演講。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個問題:在集體化時代改變了農村婦女生活的中國革命,在 今天還剩下什麼?

首先我來簡單地介紹一下這本書的研究內容。自 1996 年,我和中國研究員高小賢一起合作,開始在陝西收集農村 婦女對共產革命之後、也就是 1950 年代的記憶。我們想要在 這一代人逐漸凋零之前,挖掘出她們的故事。從 1996 年到 2006 年,在六次不同的研究旅行中,我們訪問了 72 位 60 歲 以上的婦女(有些年齡遠遠大於60歲),有些曾經是著名的 勞動模範,有些曾經是當地的幹部;還有很多是普通的農村 女性。我們還訪問了同村的一些男性,他們在公社時代擔任 地方領導職務。我們問及婦女幹農活、和幹家務活的狀況、 婚姻、識字以及生育情況。這些都是明顯性別化的領域,在 這些領域內,婦女記得的經歷和男子不同。(我和高小腎一 起訪問,不過我們各自寫各自的作品——高小賢感興趣的是 和中國讀者的對話,探討集體化時代的政策得失對當代農村 地區的發展有什麼借鑒作用。)除了訪談資料,《記憶的性 別》這本書依據的主要史料還包括不少從檔案館搜集的資 料。我們發現,雖然整個 1950 年代農村地區的勞動性別分工 時常有所變化,但是,性別差異本身一直是農村生活的核心 組織原則。村裡的官員和普通村民並未對此看法提出質疑。

今天我講的故事大多數是關於正在消失的過去,但是, 我要從一個現在的故事開始講起。當我們試圖認識歷史時, 我們總是把現實作爲出發點,而且,我們對現實的關心塑造 了我們研究歷史的視角。這個故事是關於我在 2013 年 12 月 遇見的一個 46 歲的婦女,我把她叫做秋草,雖然這不是她 的真名。過去的 9 年,秋草一直是合陽縣城郊外的一個村莊 的村莊委員會會長。合陽縣城距離西安幾個小時,在 2001 年和 2004 年,我在去 G 村(合陽地區)的路上路過這個縣 城。在靠近陝北的合陽地區點綴著許多深深的峽谷。這個地 方用土做建築材料,一年四季缺水,當地有紡織和其他手工 業的習俗,地方戲很普遍,以捏麵人慶生,還把自家織的手 絹作爲結婚禮品,所有這些都塑造了當地家庭經濟和社交的 模式。

在 1996 年到 2006 年期間去陝西農村的旅途中,每當路 過縣城時,我總是震驚於中國內地小縣城的爆炸式而又無序的發展。這些縣城的發展通常並沒有受到外界的關注。然而一旦駛離這些縣城,準確無誤的鄉村景觀又出現了。但是,在 2013 年 12 月的旅行中,我發現合陽縣城已經擴張成爲一個城市,並吞併了附近的鄉村地區。而且這種擴張是向著高處發展的——一棟棟高樓大廈在縣城郊外拔地而起,爲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縣職工提供住所。

我們抵達後很快便啓程去見村長秋草。但是,村子在哪 兒呢?在我們坐車去見她的路上,我一直期待車窗外能出現 鄉村景觀,但是,整個路程中我沒有發現車外的景色發生任 何變化。接著我們到達了一家窗飾店,客人在這裡挑選窗簾 來裝飾他們的房間。我被告知秋草是這家店的老闆,但是她 自己不經營,因爲作爲一個村長她太忙了。在這家窗飾店 裡,我們和秋草聊了幾個小時。窗飾店是個很有趣的地方, 它透露了農村如何被捲入城鎮化並快速發展,它的消費情 況,以及村民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

秋草在家裡的 5 個孩子中排行中間(在集體化時代,一個家庭有這麼多孩子是很普遍的事情)。他的父親是學校系

統的僱員(即不是農民),她的媽媽用秋草的話講是個「典型的農村婦女」。秋草在1981年或者1982年從初中畢業, 正好趕上改革開放的初期。她畢業後跟著她哥哥做生意。她 的哥哥是裁縫,一開始做縫紉,後來開始賣布。

1988 年,秋草在她 22 歲的時候和一個她從初中起就認識的電工結婚了。她稱當時的情形爲「自由戀愛」。她的父母並不同意他們結婚,因爲父母認爲這個電工有太多的兄弟姐妹,又住在很遠的村子裡,並且那個村子裡的人還會因爲秋草沒有傳統技能而瞧不起她。爲了讓他們分手,秋草的父母甚至將她鎖在家裡十多天。秋草喜歡他因爲他「人好」,而且長得帥。一直到 5 年後她的父母才同意他們結婚。結婚後,他們先一起賣菜,後來又重新和她的哥哥一起做服裝批發生意。她在 1991 年進入服裝業,開了一家商店。之後她又開始賣水泵。

她在 1989 年生了一個兒子,兩年後又有了一個女兒(儘管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但是秋草說實際上計劃生育政策在他們村執行並不嚴格,她繳了大概 640 元罰款)。她懷孕期間照常工作,並且她特意挑選了生意的淡季懷孕。她非常擅長做生意,賺了 10 萬元。在 1997 年她爲自己和家庭蓋起了村裡的第一棟 6 層的樓房。

2004年,她的兒子在念完初中一年級後表示要退學。對 於秋草來說,這是作爲一個母親的緊急時刻。她關了商店, 把生意交給她的哥哥,自己在兒子的學校附近租了一個房間 陪讀。兒子最終留在了學校。後來兒子在一家職業學校學習 鐵路工程專業,現在已經找到工作了。她的女兒則很快就要 從西安音樂學院畢業。 2005年,秋草當選爲村莊委員會的會長。那個時候,婦聯正在發起一項運動,他們選中一些婦女,並讓她們去競選村莊委員會會長一職,但是秋草並不是婦聯看中的候選人。有的人認爲她的丈夫更合適當候選人,有的人則告訴秋草她比她的丈夫更合適,並推選了她。秋草在300戶村民家裡挨家挨戶走訪並提醒村民,因爲從前的村長不夠重視和負責任,村子裡的基礎設施已經二十多年沒有修過了。她承諾如果當選會修路。最終在870張選票裡,她贏得了四百多票。

秋草已經做了9年的村長。問及她的成就,她列舉了修 路、供水。她獲得了政府資助的開發項目共計 300 萬元。但 是,她最重要的決定是村集體投資。和大多數村莊一樣,她 的村子也被急速擴張的城鎭呑併,村民們卻無可奈何。他們 的集體土地被收買,且被安置在新樓房裡。農民不但失去了 土地,也失去了收入來源,因爲他們除了種地,沒有別的技 能。眼看著村裡的土地被出讓給城鎮,秋草把村民召集起 來,說服村民把土地出讓金用作集體投資。他們建築了用於 長途運輸和批發的裝卸倉庫。倉庫樓上租給外來打工的人。 他們環投資於社會福利。他們建了一個托兒所,它的隔壁是 一個正在建設中的養老院。不遠處是一家婦女手工製品的生 產合作社。但是,秋草說有些項目進展不是很順利。—些村 民對獲得的土地出讓金感到滿意,他們並不願意做收租金之 外的事情。而對於年輕人來說,他們通常都到大城市碰運 氣,這種從鄉村向城市的流動成爲人類史上最壯觀的人口遷 移。等到他們年紀大了,他們可能會回到村子,也可能不同。 事實上, 秋草說她也不清楚選舉女性做村長的趨勢是不是會 持續下去,因爲太多的年輕人都已經離開了。

我們如何看待秋草的故事?對於我來說,這和我試圖理解的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期,農村女性在集體化時代的生活息息相關。也許乍看之下,現在和那個時代完全不同,但是秋草是一個特定環境下的產物,而這個環境來自於前面幾代人所創造的社會變化。連接至當代和集體化時代的問題是:大歷史,即那些我們認爲帶來了巨大和迅速變化的歷史事件,是如何和普通人的個人生活及集體生活產生聯繫?在地方層面上,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培養了秋草?她的例子幫助我們回答了我剛才提出的問題,即革命在當代還留下了什麼?這些問題帶我們回到 1950 年代。

社會主義集體化中的四個場景

(一)空間

在常規的革命敘事中,中國共產黨對於農村婦女的解放意味著女性第一次可以外出——參加會議、務農、上識字班、或者是去串門。婦女們可以外出做這些事情,意味著要推翻封建社會中把婦女限制在閨閣和庭院的勢力。因此對農村女性的解放,是一次將她們帶入此前所不被允許進入的社會空間的運動。

這種婦女自此邁入了一個更廣闊的社會空間的敘事主題,也的確出現在婦女的個人敘事中。她們使用革命敘事所提供的語言來表達婦女地位的提高。例如,很多女人都講了一個好像發生在她們每一個人身上的、一模一樣的故事——有人敲門問是否有人在家,家裡的婦女聽到敲門聲回答「沒

人,沒人在家」。這個故事經常在政府的宣傳中被使用,去 證明女性的自卑和需要提高她們自盦心的必要。但是,這種 把家同等於約束,把跑來跑去等同於解放的故事往往和其他 複雜的概念,如空間、移動和安全交織在一起。婦女常常把 在外界,即不受保護的空間裡的身體活動,和困難、危險、 暴露以及羞恥感,而不是和解放,聯繫在一起。有些婦女的 童年是在洮難的路上度過的; 有些婦女則強調她們的童年和 青年早期是在躲避土匪和士兵中度過的。由於兒時家庭中的 成年男性因爲戰爭、外出打丁、入伍,或者躲避入伍而離開 家庭,家中的女性往往不得不「外出」種地、賣紗線、乞討, 以及其他方式來勉強維持生計。1949 年前的「走出去」常與 令人羞恥的勞動聯繫在一起。但是,1949 年以後,婦女們學 會了將「留在家裡」與家庭壓迫和社會地位低下,而不是與 安全感和體面,聯繫在一起。這些層疊在一起的關於「走出 去」和「留下來」的詞語含義有助於解釋爲什麼婦女常常聲 稱 1949 年以前她們被限制在家裡,即便她們故事中的細節 透露了相反的情况。

1950 年代共產黨的到來,伴隨著有意識地對性別化的鄉村空間進行改造。這些改造通過掃盲班、報紙插圖、合唱、戲曲表演等方式進行。其中核心方式是動員婦女定期下地幹活。這些活動煞費苦心地建立起了一個複雜的新社會網絡,並向年輕婦女提供了一套可以解釋她們行爲意義的新的語言。

在中國官方對「婦女如何加入革命」的敘述中,原因通 常都歸功於一個英勇的男書記或者游擊隊戰士對受壓迫的 年輕女性的招募(最著名的例子是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

軍」)。1949 年以後,男性幹部被派到農村擔任農業技術員 和黨的政治指導員,向婦女提供資源、技術並進行精神動 員。然而,爲農村婦女創建社會網絡和一套新的語言,則主 要是婦女的工作。在 1950 年代, 這項任務是由下鄉工作組 大部隊中的一部分成員,即到農村「蹲點」幾個星期到一年 的婦聯幹部執行。這些婦女當中,有很多才剛剛高中畢業, 還有一些是年輕媽媽,她們把嬰兒丢給親戚照顧,自己遵循 **黨的指示到農村去幫助農民們改造社會。在村子裡,這些婦** 聯幹部和當地婦女一起勞動,一起吃,一起住(他們會付給 當地家庭一定的費用)。她們還幫助調解家庭矛盾,鼓勵婦 女們上夜校,組織托兒所,並同婦女們談論當前政治任務的 重要性。如果村子裡缺乏有經驗的女農民,婦聯幹部會甄選 出潛在的模節。這些模節通常是年輕的已婚婦女。婦聯幹部 還會開辦培訓班,教當地婦女農業技術。她們經常發現農村 婦女們不願被選爲婦女代表,一方面她們的家人擔心成爲代 表會有損名譽並減少家務活兒的時間;另一方面除了那些在 國民黨政權下被強制任命,並經常因爲是地方負責人而受到 侮辱的男性地方領導人之外,她們並沒有其他地方領導者可 作爲榜樣。

總而言之,革命的意義,從空間的角度來講,是性別化的。伴隨著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運動而來,社會空間的利用方式、意義和個人對空間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但是,在這幅空間地圖的各個節點上,對女性的安排都不同於男性。1949年之後,年輕婦女能夠自由行動的一個常見障礙,是她們的公婆擔心婦女們在村子裡不受限制地跑來跑去,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她們提出離婚。公公會鎖上門,不讓一個出

去開村子會的兒媳婦進家門;婆婆會打她,不給她留飯吃; 丈夫要麼悶悶不樂,要麼破口大罵甚至是毆打她。這些情形 多次出現在訪談的內容中。雖然危險的原因與解放前的不 同,但是至少在一段時間內,「走出去」對於農村婦女來說 仍然充滿了風險。

從 1950 年代開始,婦女在村子裡露面的社會規範發生了轉變。可是這裡有一件令人感到諷刺的事。婦女們這時候可以安全地出入於村子內外,並且學會了拒絕 1949 年以前如果她們的家庭狀況好一些,她們就會奉行的關於體面的定義。但是,她們同時也記錯了曾經發生在她們身上的故事。即,她們把過去記成限制,而不是缺乏保護的暴露。這樣做,即便同時在譴責,她們也間接地強調了足不出戶是種美德。

(二) 家務活

集體化的那些年,婦女們被告誡要走出家門,下地幹活。但是她們從未把家庭空間抛在腦後。家務活被嚴格看作是家庭內部的事兒,無法創造價值和提高生產力,除了被當成註定會消失在越來越遙遠的共產主義未來的殘餘之外,並不被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提及。婦女們非常清楚地記得,通電以前她們整夜伴著昏黃的燈光,趕製家庭需要的布、衣物和鞋子。

紡線織布和針線活體現了重複的、不間斷的、短暫的, 偶爾又有創造性的家庭時間。在 1949 年之前,許多婦女紡 線,還有一些婦女織布、繡枕頭、做鞋,並把它們拿到當地 的集市上賣。但是隨著集體化的推進,爲了銷售而在家裡紡 線織布的行爲停止了。擁有專長的婦女,比如那些會繡裝飾 婚床用的精緻枕頭的婦女,繼續通過用刺繡交換糧食來補充 收入。但是這些交換是非正式的,不受法律認可的。

另外,婦女還通過自己的勞動爲人口越來越多的大家庭做衣服。這是因爲在農村地區,現成的衣服和鞋子總是姗姗來遲,而機器做好的布匹又總是稀少缺乏,並由國家定量分配。最近 Jacob Eyferth 對於集體化時期的棉花種植和紡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已經開始量化這一嚴峻的畫面。國家從農民手中以低價收購棉花,用來給城市人做衣服,或者爲了其他工業和軍事用途。農民家庭得到棉花布票,但即使拿著這些布票,棉布的價格仍然太高,所以農民們更傾向於在灰色或黑色市場賣掉這些布票。婦女們每天晚上紡織用的棉花都是從棉鈴上第二次採摘得到的,或者來自隱藏和扣留那些本該上交給國家的棉花。婦女們靠著白天爲國家工作後剩下的力氣和撿來的棉花,在夜裡紡織。在集體化時期,婦女的隱藏勞動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

這種勞動卻沒有出現在 1950 年代的任何文字紀錄中。 對集體化時期的分析必須要承認,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使得 婦女的很多實際的勞動被視而不見。同時,也必須考慮到勞 動的物質成果,例如鞋底、衣服,和充滿了個人創意的手織 的床單和手帕、繡花的鞋襯和枕套,以及這些勞動給長期休 閒和睡眠不足的生活帶來的新鮮感和樂趣。

伴隨著農村家庭中孩子的增加,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因 為國家成功降低了嬰兒死亡率,而且 1970 年代以前國家還 未全面地關注計劃生育,家庭裡的兒童數量大增,造成了普 遍的疲勞。有個婦女告訴我們:「農業社做活的時候,那國 家啥都管,管的能叫我們種好糧,多收,多吃。抓娃他卻不 管哩,哈……抓娃(陝話:生孩子的意思)抓這些多受可憐, 多受累呀,我抓了幾個娃子你都笑話呀,兩個娃子,六個女 子,眞把人抓死了,餓死了,苦死了……解放後,抓娃抓著 氣了,咋不管的叫人不生娃哩,這可憐的。」

因為缺少足夠的托兒所和幼兒園,對孩子的照料也不夠好。農村婦女的口述中,經常夾雜著孩子受傷了,受到野獸驚嚇了,被拴在炕上了,淹死了,以及死於治療不及時的故事。這一代人的生育和養育經歷,意味著在 1979 年獨生子女政策出台的時候,她們常常是它最熱情的支持者,她們負責動員村裡的年輕婦女,但她們屬於完全不同的世代,要她們終止懷孕總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黨和國家宣稱他們已經解放了婦女,把她們從「內」帶向了「外」。在這個受到更多重視和帶來更高地位的外部世界裡,婦女從事有報酬的工作,擁有政治可見度,並且得到了解放。確實,在 1950 年代,婦女在鄉村空間出現的規範開始轉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關於婦女日常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的公共討論卻消失了。婦女的家庭時間和公共運動時間交織在一起說明,官方版本中政治變革敘述只被一半的農村人口所經歷,是極其不完整的。

(三)為革命樹立模範

一些農村婦女被黨和國家幹部指定爲讓大家仿效的勞動模範,這些勞動模範總是出現在書面宣導文字之中。其中最著名的模範前往西安或北京參加被大量報導的全國會議。作爲社區美德和成就的承載者,勞動模範是將各個村莊的空間與想像的地區、國家,甚至國際空間相連接的路標。

作爲一個農業勞動模範或者農村帶頭人,男性所需的是 精通地甚至是創造性地從事那些一直以來都是男人的工 作。然而,女勞模卻被要求從事與傳統女性截然不同的勞 動,即便她們同時仍繼續做著以前的那些活兒。女勞模塑造 了性別分工的變化,填補了因男人們離開農業生產而去建設 大壩和擔任農村工業和技術監督職位所造成的勞動力短缺。

除了種棉花、開拖拉機、飼養牲畜這些勞動模範本人要做的勞動之外,塑造一個勞動模範還需要更多人的努力。通常,婦聯幹部來到農村挑選勞動模範。這些幹部們與勞模一起吃,一起住,寫女勞模的宣傳稿,有時還幫她們處理信件,代擬演講稿。當發現張秋香善於栽培棉花卻不善言談時,婦聯幹部們開始了她們的工作。

當婦聯幹部談到一位著名勞模演說時,提到張秋香的例子,說她「既不識字,又不會說話,不會總結自己的經驗,要問她務棉經驗,她說就是口外種好,按時鋤好,打卡好就對了,硬是咱們婦聯同志從她的那些話中掏出來,提煉出來」。

在婦聯幹部撰寫和編輯的協助下,張秋香提出了棉花種植的一系列很容易理解的警句,刊登在 1956 年的一份出版物上。這些簡練的準則包括小心地準備土壤、施肥、選擇和準備種子、早播種、間苗、除草、在恰當的時刻灌溉、打尖、對抗害蟲,以及使用改進的技術收穫棉桃。婦聯幹部負責譜寫這些格言:

運用辯證法 看天看地 務棉花 格言和其他相似的內容帶我們窺見了婦聯和其他政府幹部塑造女勞動英雄的艱難過程。婦聯幹部挑選他們想要宣傳的內容。例如,有個勞動模範的丈夫因爲反對妻子的工作,導致妻子大爲惱火,並被她繞著家裡的磨石用掃帚追打,一直到幹部來懇求,這位身爲勞動模範的妻子才住手一這樣的故事不會出現在印刷出版物中,而是在四十年後從一個婦聯幹部的口中始可得知。和男勞模的故事相比,關於女勞模的報導,更強調婦女們在積極生產和先進的政治覺悟之外對家務事的貢獻。例如,1952年婦聯對山秀珍的報告中,在愛國運動計畫之外,提到她還打算完成以下任務:促進婦女識字,組織田間勞動,慰問軍人家庭,向國家捐糧食,爲全家老小做衣服,監督孩子的學習,以及不與丈夫吵架。

(四) 記憶和遺忘: 干支紀年

對於 1950 年代的農村婦女而言,西曆年分沒有什麼意義。農村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陰曆,而且這是循環的年月,而不是一般所謂的向前進的年歲。如果你問許多村裡的婦女關於毛時代國家組織的運動時間的先後順序——我稱之爲「運動時間」——她們認得的名稱有互助組、初級生產合作社等等,但她們許多人搞不清順序,或者重新編排了內容。比如,如果我們問及大躍進,婦女們都知道這個詞,但她們回答的時候很少使用它。相反地,她們談及這個運動時說「我們煉鋼鐵的時候」,或者「我們吃食堂的時候」。根據政策,人們打破他們的廚房爐子,把鍋子熔化了煉鋼,還在公共食堂吃飯,用一天的工作換一天的食物,幾個月輝煌地吃食堂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由政府導致的幾年饑荒。簡而言之,婦

女們使用的語言把運動和饑荒解構爲具體地影響她們日常 生活的元素。

婦女們還挪用並改編了國家的語言以表達不滿。比如,在官方的術語中,「舊社會」指的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新社會」成立之前的所有時間。有些婦女按照官方語言的說法,用「舊社會」這個詞彙指 1940 年代。但另一些婦女說舊社會一直延續到 1963 年左右,大躍進饑荒尾聲的時候才結束。在另一個例子裡,有個婦女把 1980 年代改革開放之前的全部歷史稱爲「舊社會」。由於沒人把「舊社會」當成一種讚揚,婦女們吸收了「舊社會」是壞的這一含義,所以年代的後移暗示一些婦女認爲絕大部分集體化時代都是艱難時期。她們使用這一術語的時候,繞過並削弱了多年來官方政治工作中對這一詞語費盡心思的設定。

談及 1950 年代時,男性與女性所記得的一系列事件, 有些是重疊的,但並不完全一致。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爲某 些國家政策是針對婦女所制定的。即使在一個家庭內,女孩 子和婦女的日常生活也和男孩子和男人們的不同。如果不時 常注意性別,我們會錯過理解婦女公認的勞動和隱形的勞 動,是如何影響毛時代的社會建設進程。

對所有婦女來說,一個可靠的時間標誌是她們孩子的出生年分,根據中國十二個動物生肖的循環來記憶——鼠年、 牛年……等等。儘管婦女拼凑著或者忘記了集體化時期發生的事情,十年來我們一直聽見她們準確地說出每個孩子的生肖年分,在 2006 年我們請三個婦女根據十二生肖的時間順序排列一下主要的事件。我們提供了十二生肖動物的圖畫,還把日曆上的年分寫在邊上,然後再一次詢問過去幾年裡她 們已經告訴過我們的事情。有些是全國範圍的,比如合作社的成立;有些是地方性的,比如一個滿懷嫉妒的破壞分子把鹽放在他正在賣的豆腐裡,還告訴每一個人,這難以下嚥的玩意兒是由當地一個婦女當領導的合作社生產的,以此來詆毀這個婦女。當我們說出每個事件的名稱時,每個婦女都把事件調整到她自己孩子的出生年分。當我們提供十二動物生肖時,一系列的「我記不得什麼時候」的回答變成了確切的年分。

記憶和語言的這種性別化的分歧並不是「自然」的,婦女們對生育態度的世代差異也不是「自然」的。這些分歧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在不同時刻被理解的方式不同,以及革命政策提到或忽視「男性」和「女性」常規任務的程度的不均衡。有人也許會問,中國婦女有沒有革命?的確,她們生活中所熟悉的空間和時間在 1950 年代已經改頭換面,然而,性別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塑造了她們擁有的革命。

當我們問革命對於農村婦女是好的還是壞的這一問題時,我們可能丢失了一些重要的東西。通常,女性主義學者批評中國政府過於關注階級,而忽視了性別。認爲政府花了過多的精力把婦女拉到田間勞動,而不是爭取家庭內部和政治領導權的平等。我不認爲這個批評是錯的,但這遠遠不是人們關於國家政策和它對農村婦女的影響唯一能說的事情。這是我想添加的內容:農村婦女的勞動自 1960 年以來一直對國家經濟策略起著核心作用。毛去世前和改革開放的戲劇性的歲月裡,許多男人都不再從事基本的耕種;有些在田裡從事監督和技術的工作,有些沒有離開村子,但去小規模的集體企業工作。還有一些從 1970 年代開始就去了城市,

成爲臨時合同工。耕種越來越成爲婦女白天的工作;晚上, 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她們忙著家務活。由於農業是毛 主義經濟的主要引擎,生產的剩餘用來爲工業化提供資金支 持,也許你甚至可以說,婦女是毛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

這個故事和我們通常講述的毛時代的故事非常不同。也 許是時候把這個問題轉個方向了,不僅要問「中國婦女有沒 有經歷過革命」?或者「革命對婦女是好事兒嗎」?還要問 「如果沒有中國婦女的看得見以及看不見的勞動,這場革命 以及後來建立在毛時代的建設基礎上的改革還有可能發生 嗎」?

在我結束評論之前,讓我們回到秋草的故事,並把她的世界和她母親、祖母的世界相互比較。秋草的時代與集體化時代的差異是清晰可見並且驚人的。在過去,戶口制度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儘管 1950 年頒布了婚姻法,年輕婦女通常都嫁給了父母指定或認可的年輕男人。她們養了很多的孩子,並艱難地爲孩子們提供衣服和食物。農業生產在經濟生活中佔據支配地位,婦女作爲務棉花的勞動模範是熟悉的。但是,婦女作爲村子的領袖,監督公共事業、社會福利和投資項目,這是無法想像的。

現在,大多數適齡勞動力都離開了農村,婚姻由自己做 主也不再令人震驚。的確,即使在農村婦女中間,也有因爲 其他的追求目標而推遲婚姻的情況。可以生幾個孩子受到國 家政策的限制;撫養孩子、承擔孩子的教育和結婚費用,也 都是一筆昂貴的開銷。養育孩子的成本,加上節育方式的普 及,導致農村的家庭規模開始接近於城市模式。農村婦女仍 然紡織,但是大多都是用於儀式場合的禮物交換。如果她們 有現金,她們還會購買窗戶裝飾品。在許多地區,農業生產 已經在經濟生活中邊緣化了,土地本身正在消失。婦女成爲 村領導雖然不常見,但已經不是無法想像的,雖然秋草在本 質上講是一個被選舉出來的城市地區的管理員。

即便如此,當年的國家社會主義和今天的國家控制卻管 理鬆散的市場經濟,仍然存在著連續性。在這兩個時期,農 村的資源被過度地榨取,不成比例地支持城市的經濟發展項 目。過去是棉花和糧食,現在是勞動力和土地。流動的農村 勞動力推動了城市經濟繁榮,城市和小城鎮卻開始吞併周圍 的村莊。對農村土地的奪取給當地政府帶來的利為遠遠多於 帶給普通村民的。在這兩個時期,婦女的有些勞動形式是可 見並被高度重視的,但有些對家庭的再生產和更大的經濟活 動至關重要的勞動卻是隱蔽的。在這兩個時期,雖然家庭之 外的性別化勞動分工多次改變,婦女始終擔負著發展農村經 濟和教育好子女的責任。(即使在今天,作爲一個孝順的好 媳婦,秋草承擔所有的做飯、洗衣服和照顧公公的責任。) 在這兩個時期,外來的那些和婦聯多多少少有關的婦女,都 幫助婦女發展新的可能性,並爲婦女的新角色提供支持。臺 無疑問,集體化的歷史塑造了今天包括基礎設施和教育在內 的諸多面向。因爲這段歷史,人們發現婦女在公共場合的出 現,和在公共領域扮演重要角色,不再是無法想像的。

但這不是一個「從此以後,農村婦女們就過上了幸福生活」的快樂故事。婦女們並不爲集體化的消失而感到悲哀,畢竟,集體化打著幹革命的名義,非但沒有解放農民和婦女,反而剝削了她們。但是,當前政權下有限的社會福利,勞動力流動,未被注意的性別歧視,以及農村土地的流失,

也給婦女出了新的難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有趣的是,秋草訴諸於集體化時期的一些特徵,即鄉村會議、集體投資、社會福利,來試圖爲她正在消失的村莊創造出一個適宜居住的未來。正如她祖母和她母親那一代人,在秋草生活的世界,被村子外控制和推動的大型國家工程塑造了環境。正如她祖母和她母親那一代人,她憑藉智力、創造力和努力,在局限中運作和經營。在一個正在消失的地帶,她和鄉親們期待創造出一個宜居環境。它正在建設之中,並擁有一個偶然的和不確定的未來。